

97.16(2)
87-95

封3 1997/1083IX/016/002

20629(1)

第16卷 第2期
1997年5月人类学学报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Vol. 16, No. 2
May, 1997

在中国寻找第一把石刀

张森水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100044)

Q981

摘要

A

寻找最早的文化遗物是人类起源研究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直被各国考古学家所重视。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开展较早, 已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能扩大调查, 多学科深入研究, 有希望对此项研究做出重大的贡献。

关键词 石器, 早更新世, 其他文化遗物

1 引言

本文是在第52次香山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人类起源问题。在从考古学角度考虑讨论主题时, 笔者给自己的发言出了一个题目: 叫做“让我们全力以赴地去找第一把石刀”, 后简化成目前的题目。为什么用这样的命题? 首先是突出人的特征。依恩格斯的观点, 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卷), 寻找第一把石刀说则源于此。题目的前一部分是借用安特生(Andersson G.)的一句话。1921年夏年, 安特生考察周口店龙骨山, 当他发现堆积中有石英片时, 他激动地对同行的格兰阶(Granger, W.)和斯丹斯基(Zdansky O.)说: “这里有古人类; 让我们全力以赴地去找它吧”(Black et al: 1933, p. 6)。安特生的预言业已实现, 我也相信, 在中国找第一把石刀也决不是空想, 有希望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里所说的第一把石刀不是绝对的概念, 而是泛指早更新世(特别是距今200万年前)人类生产的石制品, 其他材料制品以及生产和生活中残存的文化遗物。早更新世的底界和顶界的时间, 依刘东生等(1985)的意见, 底界(高斯与松山界面)距今243万年前; 顶界(松山与布容界面)距今73万年前。本文拟对早更新世人类文化研究的历史作简单地回顾, 对现状作点粗浅的分析, 在此基础上, 探讨可能的贡献, 以及在如何去做等方面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向同行们求教, 以期共同促进人类起源问题的研究。

2 简史与现状

寻找最早的人类文化遗物, 一直是史前考古学家所努力的工作之一, 始于本世纪的初期。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 考古学家们不懈的努力, 多方地探索, 在早更新世文化遗物

收稿日期: 1996-11-04

的寻找方面,取得了可喜的结果,积累了相当多的材料,使文化原始的时间不断延长,空间不断扩大,争论也日渐增多,提出了一些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早更新世地层中找到“石器”,恐首推 E. Wayland 的工作。他于 1919 年宣布在乌干达的 Kafu 河谷高阶地砾石层中找到“石器”。它们是一端有破碎痕迹的扁平的石英和石英岩砾石,并于 1927 年将它命名为卡夫文化 (Kafuan)。此后,在非洲南部、中部和北部相继发现与卡夫文化“石制品”相似的“砾石石器文化”。这些破碎的砾石是否人工制品,在考古学家间存在不同认识。至本世纪 50、60 年代,多数考古学家认为,所谓卡夫文化的石制品,实非人工制品,是水流作用下砾石相互碰撞的产物 (Coles and Higgs, 1969)。

目前被公认的、早更新世的石制品是路·利基 (L. Leakey) 于 1932 年公布的。石制品发现于奥杜威峡谷的第一层 (Bed I) 上部堆积中,后来被命名为奥杜威文化 (Oldowan Culture)。依钾氩法测定,含石制品地层的年代为距今 1.9—1.6 百万年,平均约为 175 万年。石制品的组分包括石核、石片、各式砍砸器以及少量的刮削器,还有石球和雕刻器等 (Leakey, 1971)。在此后的几十年工作中,在其上的第二层 (Bed II) 中发现非洲的阿舍利文化 (Acheulean),时间超过距今 100 万年。在第二层顶部的地层中还发现 42 件砸击石片 (主要出自最顶部的 BK 地点,计 37 件)。依古地磁测定,第二层顶界的年代可能在距今 110 万年前。这可能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应用砸击技术的资料。此外,还有消息报道,在中非的萨洛高地红土层中和扎伊尔上卡菲盆地发现的砾石石器,其时代可能早到距今 200 万年前。对其中部分地点的时代及个别地点石制品的性质也有不同的认识。

进入本世纪 70 年代,考古学家们在肯尼亚北部特卡纳湖 (Turkana Lake) 东岸开展广泛的考古调查和发掘,1976 年由 J. Harris 和 G. Issac 报道了以往 5 年工作的重要成果之一,在 Koobi Fora 组 (Formation) 下段顶部发现在当时可能是最早的人类文化遗物,它在时代上与奥杜威文化大体相当,但文化特征迥异,这一石制品组合被定名为 KBS 工业。

KBS 工业的石制品出自 KBS 和 HAS (N. 4°25', E. 36°20') 两个地点,共发现 383 件石制品。它们的个体比较小,打片用锤击法,石核有单台面与多台面之别,石片虽多是不定型的,但有一定数量呈三角形的,个别的类似长石片 (Flake-blade),石器的主要类型是刮削器,有用石片做的,也有相当数量是用小砾石做的,砍砸器是用砾石做的,比奥杜威文化同类石器个体要小。其时代一说为 2.61 ± 0.26 百万年,另说为 1.61 百万年,近有新研究成果,认为 KBS 凝灰岩的时代为 1.88 ± 0.02 百万年 (Kibunjia, 1994)。

Karari 工业发现于 Koobi Fora 组上段,依钾氩法测定,大约为距今 120—160 万年前,或 132 ± 11 万年,或 156 ± 2 万年。该工业比较重要地点如 FxJj 18 地点,含 3 个文化层,上层是生活面 (在古土壤面上),石制品密集,中层含凝灰岩薄层,发现过石制品;下层比中层低 5m,石制品也很多。

Karari 工业与 KBS 工业有诸多相似点,石制品多较小,打片用锤击法,石核以多台面居多,石器主要是用石片做,刮削器是主要类型,砍砸器数量少,个体较小,没有手斧、手镑和石球等重型石器,所不同的是在 Karari 工业中存在少许尖刃器。

进入 80 年代,东非地区考古工作重点从特卡纳湖东部转向西部地区,在埃塞俄比亚的哈达 (Hadar) 地区奥莫 (Omo) 地区和扎伊尔的塞姆利基 (Semliki) 河上游地区也发现了早期人类的文化遗存,据 Kibunjia (1994) 报道,在上述 3 个国家已发现了距今至少在 200 万年以前的考古遗址 13 处,其中最老的可能早到距今 236 ± 4 万年。上述 13 个地点分属 3

个国家；埃塞俄比亚 10 处，肯尼亚 1 处和扎伊尔 2 处（详见表 1）。

表 1 非洲超过 200 万年的旧石器遗址

国家	地区	地点	地质段
埃塞俄比亚	哈 达	Kada Gona 2-3-4	Kada Hadar
埃塞俄比亚	哈 达	West Gona 1 Locality 1	Kada Hadar
埃塞俄比亚	哈 达	West Gona 1 Locality 2	Kada Hadar
埃塞俄比亚	哈 达	West Gona 2	Kada Hadar
埃塞俄比亚	哈 达	West Gona 3	Kada Hadar
埃塞俄比亚	奥 莫	FtJi 1 Locality 204	Member F
埃塞俄比亚	奥 莫	FtJi 2 Locality 396	Member F
埃塞俄比亚	奥 莫	FtJi 5 Adj. Locality 4	Member F
埃塞俄比亚	奥 莫	Omo 123	Member F
埃塞俄比亚	奥 莫	Omo 57	Member F
肯 尼 亚	特卡纳湖西	Lokalalei	Kalochoro
扎 伊 尔	塞姆利基河上游	Senga 5a	Lusso Beds
扎 伊 尔	塞姆利基河上游	Kanyatsi 2	Lusso Beds

注：依 Kibunjia, 1994。

在欧洲，早更新世的石制品报道不多。在前苏联曾记述过前舍利文化 (Pre-Chellean) 系采自地表，时代难定。属于这个时代的可靠的文化遗物出自法国西南部的一洞穴遗址中，即 1938 年发现的 Vallonnet 遗址。依与石制品共存的动物化石，将其时代定为维拉方期 (Villafranchian)。该遗址含文化遗物的堆积分为 C、B₂ 和 B₁ 层，从中出土了少量的有粗修痕迹的石片，原料为石英岩、石灰岩和燧石，还有几件遗有片疤的石英岩和石灰岩块，只有 1 或 2 件标本有很好的单面加工的痕迹。此外，在若干犀牛的胫骨上可见清楚打击的痕迹。

在亚洲，在巴基斯坦和泰国有被认为很早的石制品。它们是否真是早更新世时期的石制品或其人工性质是否肯定，尚待多方面证实。从目前看这方面工作在中国是做的比较多，也为国际旧石器考古学者所关注。

在中国，研究早更新世石制品和人类活动有较长久的历史。1934 年步日耶 (H. Breuil) 第二次来华，在研究中国猿人石器之余，观察了桑志华 (E. Licent) 和德日进 (Teilhard de Chardin) 从泥河湾采来的化石，他认为在若干化石上有石器砍砸的痕迹，于 1935 年撰文发表了发现，还着重记述了一件石器，定名为粗大的手斧 (Coup-de-point grossier)。对步日耶的观点，德日进则特保留态度，认为需要进一步工作来证实，他的看法与步日耶的文章同时发表在法国人类学杂志上。那件“粗大手斧”现存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其人工痕迹是不清楚的。裴文中通过对中国猿人石器及其他文化遗物的研究，综合分析其文化成就，提出如下的认识：“中国猿人之文化，实非原始之文化，将来或可发见，较中国猿人时代更早之人类” (裴文中, 1948)。此后约十年，贾兰坡和王建 (1957) 提出“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的看法。上述论文对在中国早更新世地层中寻找人类最早的文化遗物具有指导性意义。

解放后，这方面工作的首次实践是西侯度地点的研究。西侯度地点 1961 年和 1962 年发掘，发现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和被认为是人工的石标本，并于 1978 年出版专著。对被认为是石制品的标本的性质，从发现之始，就存在不同认识，中外学者怀疑它们是河流撞

碰所产生者不乏人在(裴文文、张森水, 1985; Clark and Schick, 1988)。

寻找早更新世石器卓有成效的工作是近十多年来在河北省阳原县境内泥河湾地区的调查和发掘。最先是尤玉柱等于1980年报道了小长梁地点从河泥湾组的地层中发现的石制品和一些骨片。原研究者依地层和古地磁资料推测, 小长梁遗址“是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年代可能超过二百万年。”(尤玉柱等, 1980)。对该地点的古老性几位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在当时已提出了质疑。对其石制品所强调的原始性也有人重新加以研究, 指出若干进步性质, 但用“石器使用了优质原料(燧石占小长梁石器工业的95%以上)”来解释(黄慰文, 1985)。从此以后小长梁遗址曾做过多次发掘, 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至今没能发表一个发掘坑的剖面, 没有报道每个发掘坑具体挖出哪些化石和石制品, 是一层文化还是多层文化? 故无法进行具体分析。

泥河湾地区另一重要文化地点是东谷坨地点, 该地点于1981年发现, 卫奇等于1985年公布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他们认为石器“具有显著的比较进步的色彩”; ……东谷坨旧石器地点的“文化层形成在Jaramillo事件发生之前, 估计其年代距今大约一百万年(Li Huamei等, 1982)。”(卫奇等, 1985; 卫奇, 1985)。

关于东谷坨地点, 笔者有迷惑不解之处, 即如何协调古地磁测定的地质年代的古老和石制品明显的进步性及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显示年代较新的问题。

先说石器。其加工相当精致是卫奇已指出的。笔者认为, 其精致程度超过中国猿人文化早期的同类石器, 与中、晚期者可以媲美, 特别令人注目的是其中的尖刃器, 在数量上与中国猿人文化中后期者相当(各占石器的11.5%), 而比早期者(占5.9%)占比例约大一倍。另外, 无论从形态或加工精致的程度看也远超过早期的, 也可与中、晚期乃至华北更晚时期的尖刃器相匹敌。还应指出一点在卫奇分类的尖刃器一类内, 有些清楚地属石锥类, 如原报告之图6之3和6。从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类型演变情况看, 除东谷坨者外, 石锥最早见于中国猿人文化晚期, 此后延续不断。如果石器的进步性, 如卫奇的解释: “人们的认识常常随着意想不到的发现而发生变化, 尽管这种变化有时来得非常缓慢, 但变化的大趋势总是不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东谷坨旧石器的发现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很早就已经有了高度发展”(卫奇, 1985)。事情无独有偶, 共生的哺乳动物也具有明显的进步性, 我们不妨具体地分析一下卫奇等发表的哺乳动物化石资料(卫奇等, 1985)。

所报道的哺乳动物化石计8属8种, 其中鉴定到属的5种、相似种的1种、到种的2种, 名录如下: 中华鼬鼠(*Myospalx cf. fontanieri*)、狼(*Canis sp.*)、熊(?)(? *Ursus sp.*)、古菱齿象(*Palaeloxodon sp.*)、三门马(*Equus sanmeniensis*)、披毛犀(*Coelodonta antiquitatis*)、野牛(*Bison sp.*)和羚羊(*Gazella sp.*)。依这个动物名录很难归于华北早更新世哺乳动物群中, 其原由如次:

中华鼬鼠, 在中国延续时间很长, 从早更新世到现在, 大量发现于晚更新统地层中; 狼、熊、羚羊, 仅有单个牙齿, 对断代缺乏意义; 古菱齿象材料为右上第二臼齿之后部, 依原研究者的测量和描述(“齿脊频率为7—8, 釉质层厚1.5—2.3毫米, 褶曲较为强烈”)分析, 此象化石比较接近诺氏古菱齿象(*Palaeloxodon naumanni*), 依周明镇等的看法, 诺氏古菱齿象化石“在我国的分布基本上限于华北更新世晚期”(周明镇、张玉萍, 1974); 三门马材料为一些零星的颊齿, 对这一鉴定, 卫奇等作了如下的说明: “从牙齿总的特征来看, 东谷坨的马应该属于*Equus sanmeniensis*, 但也具有*E. przewalskyi*的某些特征, 尤其是在

牙齿的测量数据上彼此有更多的接近。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东谷坨的 *Equus sanmeniensis* 是接近于 *E. przewalskyi* 的 *E. Sanmeniensis*。三门马地史分布从早更新世至中更新世晚期，最晚者见于大同青瓷窑地点，东谷坨者尚不如青瓷窑者典型。接近普氏野马的特征应给以必要的重视。披毛犀原研究者认为依第三臼齿大小比较，东谷坨发现的披毛犀应该属于更新世从早到晚的一个过渡类型；野牛，其臼齿若干特征与 *Bos primigenius* 有些相象。原始牛 (*Bos primigenius*) 在华北是马兰黄土期的常见化石。

上述东谷坨地点的哺乳动物化石组合，就其有代表性者言，虽有漫长的地史分布，如中华鼯鼠、披毛犀 (Q_1-Q_3)、三门马 (Q_1-Q_3)，但后两者形态的进步性可能反映进化上的意义，野牛和古菱齿象若干形态特征具有晚更新世特有哺乳动物物种的特征，这些哺乳动物化石可在许家窑遗址或青瓷窑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中找到对比标本，前者目前一般认为其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后者原研究者依该遗址与石制品共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中有三门马，故将遗址的时代“暂定为中更新世后一阶段” (李超荣等, 1983)，但依青瓷窑的石制品与许家窑者有诸多相似点，似允许推测，两者时间上相去不远。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到东谷坨目前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具有中国北方中、晚更新世特点，而见不到早更新世的有代表性属种。出现这种情况，是意识落后于存在呢？还是发掘区局限、发现化石不能反映时代或确实需要从地层方面再做些工作呢？这一切只有留待未来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工作，才能有符实之论。泥河湾地区自本世纪 80 年代开始持续地在工作，又从泥河湾组地层中找到多处旧石器文化遗址，已见报道的有岑家湾地点，发现石制品 897 件，但同时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甚少，有象的臼齿残片和马的趾骨，无法依此断代，石制品近似小长梁，无加工精致的尖刃器，但依地层对比，谢飞等 (1990) 认为“岑家湾旧石器地点的文化层位于下泥河湾层，层位比小长梁和东谷坨低，其地质时代应为早更新世，文化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早期，时限应早于小长梁和东谷坨文化” (谢飞、成胜泉, 1990)。除泥河湾地区外还有元谋地区。

1973 年胡承志发表了据称是 1965 年 5 月 1 日在元谋县上那蚌元谋组中发现的 2 枚人的上内侧门齿，遂引起学术界的广泛的注意，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组队，对被指认的元谋猿人化石产地，于 1973 年冬进行较大规模的发掘，挖出 3 块较好的刮削器 (文本亨, 1980)，其中之一还可能用过砸击加工 (张森水, 1987)，另外地表上采到 3 件石制品，被认为是从元谋组地层中冲刷出来的。依古地磁测定，“元谋人化石埋藏的层位则相当于 1.7 ± 0.1 百万年，即吉尔萨事件 (1.61 ± 1.79 百万年) 范围内” (李普等, 1976)，刘东生和丁梦林 (1983) 对元谋人的年代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它的年代“不应超过 73 万年，即可能为距今 50—60 万年或更晚一些”。钱方则对上述论文所质疑的各点，通过新的工作逐一加以辩证，再次认定上述年代测定结果是正确的 (钱方, 1985)。程国良等对元谋人产地的地层所做的古地磁测定的结果，虽稍有差别，但大体相当。他们认为“元谋直立人化石所在层位的年代为 1.63—1.64 百万年” (程国良等, 1977)。元谋人化石和石制品是中国境内已知最早人类遗存。

从以上亚非欧三大洲旧石器时代最早石器的发现与研究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到，目前这方面研究基础好、成果多的是在非洲，其次是亚洲，主要工作在中国。已发现最早的石器，可靠者来自肯尼亚特卡纳湖西岸的 Lokalalei 地点，时间略晚于距今 2.36 ± 0.04 Ma，可能在 230 万年左右，也有更古老的石制品的报道，如奥莫 71 和 84 组合，学者间对其时代

存在不同的认识,尚待进一步工作。

从已发现的、被认为是可靠的早更新世人类的文化遗物,其中的石制品,在类型上均有一定分化,在技术上看起来并非最原始。因此,已知的人类制造工具的历史可能再向前追溯一段时间。

如上述,在寻找最古老的石器时,由于其原始性;与自然动力造成的碎石颇难区分,误将古老地层中碎石当石制品的事时有发生。这是历史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引以为戒。

基于在早更新世地层中寻找石器,既存在对石制品与自然碎石的严格鉴别问题,也存在对埋藏石器地层时代判断的问题,故依目前的资料,讨论文化起源的时空及其流向问题,依笔者拙见,为时尚早,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有较稳固的讨论基础。

3 中国可能的贡献

中国有丰富的古猿类化石、不同阶段的古人类化石和大量的不同时代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这是几代人、80多年工作的结果。这就为进一步寻找最古老(特别是200万年前的)的文化以解决人类起源问题有了良好的基础,一些有利因素将促成我们在这方面研究会取得进展。

3.1 中国南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二元结构的确立与溯源

从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史看,工作始于南方,但本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工作在北方,近15年来,南北方处于并进状态,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打破了以中国猿人文化为主体的单一格局,确立了中国南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的二元结构,中插一些区域性文化,呈现出中国旧石器文化类型的多样性。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的分布区比较清楚,阴山山脉以南、秦岭以北,贺兰山、六盘山以东,千山山脉以西的广大地区,已知的的时间可能超过距今100万年,一直延续到旧石器时代结束。这个主体工业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有一定的发展变化,但具有明显的共同性,显示出工业发展的连续性。这些共同特点是:大量存在长度少于40mm的石制品;打片主用锤击法(仅一处例外),兼用砸击法;石核不或基本上不修理台面,且以多台面居多,石片不定型者多于形态规则的;做石器(第二类石器)的毛坯主要是石片,其类型主要是刮削器,可能在中更新世的中后期,显示出类型的多样性,尖刃器成为重要的类型;修理石器基本上用硬锤无严格控制地直接打击加工,且以向背面加工为其主要方式。

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已知分布区在秦岭以南的广大地区,在陕西南部、四川、湖北、湖南、广西、安徽和江西等省都有发现。这个工业已知时间可能超过距今70万年(房迎三等1992),最晚者为距今 37400 ± 3000 BP(上部)或 39300 ± 2500 BP(下部)(李宣民、张森水,1984)。此工业发展的脉络尚不甚清楚,可能沿着个体变小、石片石器量增加的方向发展,较早者如安徽巢湖市望城岗砾石石器高达89.08%¹⁾,广西田东牛坪坡的则高达93.6%²⁾,而至今所知最晚的地点(资阳人B地点)的石器中石片石器则占55.5%。这个工业的共性也极明显,石制品基本上是粗大的,长度常在100mm以上,在40mm以下者极少;打片以用锤击法为主,偶用砸击法。石核不予制,多自然台面,单台面石核占多数;

1) 和 2): 材料依方笥生、韩立刚(1993)和曾祥旺(1995)发表的。百分比是笔者依发表材料求出的。

第二类石器多数是用块状毛坯做的，主要类型是砍砸器，还有手斧、手镐等，刮削器很少，尖刃器极少。除广西百色地区外，广泛发现石球。

无论北方还是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由其共同点可看到明显的继承性，从大约距今 70 多万年至旧石器时代结束或临近終了，文化发展有迹可觅，但由此溯源则缺可靠的材料，那么是否可理解源自非洲或欧洲某时某期文化呢？若将其文化特点与非洲百万年前的石器工业的特点加以对比，或与非洲或欧洲乃至印度半岛的百万年前的旧石器工业加以对比，其差别之大，是十分明显的，彼此间的工业特点可谓泾渭分明。依此可推测，其源并非来自外域，至少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是这样，南方者，目前与东南亚邻国可能属同一文化区，传承关系尚不清楚，因此，目前要在中国疆域内寻找中国南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之源，还可从追踪源头中去寻觅最古老的石器。

3.2 已有成果的启示

如上所述，在我国已经找到了距今 170 万年左右的石制品（南方），或可能有 100 万年前的石制品（北方）。南方的材料发现太少，很难加以分析；北方的材料较多，依小长梁和岑家湾的石制品，虽类型尚简单，但已有相当的分化，从中所看到的技术，如打片已有一定工序，可以认定它们不是人类制造石器最原始的产品。

尽管中国早更新统地层中发现的石制品和人化石以及与人类近亲的巨猿化石仅限于几个小区和点（图 1），但已知的分布区却相当大（E. 101°58'—114°40'，N. 25°41'—40°14'），在这个广袤的地区，已发现的材料（包括哺乳动物化石）表明整个早更新世在第二、第三级阶梯区内是适于人类生存的，而且在这一区域内，分布着广而厚的早更新世地层，依元谋组的地层，其厚度约 700m（浦庆余、钱方，1984），延续时间很长，“整套元谋组的地层大致对应于 1.5±0.1 百万年到 3.1±0.1 百万年期间”（李普等，1984），在那里虽已找到 170 万年前的石制品，往更老的层位去找人类文化遗存也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元谋盆地和泥河湾盆地是寻找最古文化的不可忽视地区，工作持续下去，它们很可能会与现今奥杜威峡谷一样，在研究人类起源方面具同等知名度的地区。

在寻找最古文化方面，已有工作经验也是宝贵财富。例如，在广西、鄂西或三峡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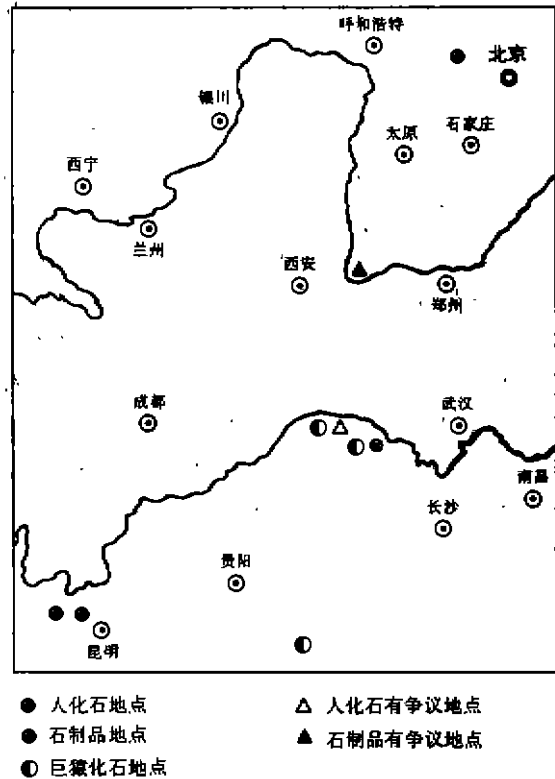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早更新世人化石和石制品（含有争议者）及巨猿化石地点

Distribution of the human fossils, stone artifacts (including some disputed materials) and *Gigantopithecus* fossils of the early Pleistocene in China

工作, 必须到高层洞中去寻找, 如建始早期人的化石(或南方古猿化石)就发现在距水面 85m 的洞穴内, 广西柳城的巨猿洞高出柳江水面约 90m; 从阶地上寻找最古人类遗存, 如在三峡地区至少要在海拔 200 米以上的高阶地中去找。此外, 巫山县大庙龙骨坡的人类近亲巨猿化石就发现于海拔 830 米的洞穴裂隙中。在泥河湾和元谋盆地已连续工作了 10 年, 取得了一些有用的经验, 能使我们更有效地去实现我们要达到的目标。

综上所述, 从目前材料看, 非洲是人类起源地的呼声甚高, 这是诸多国家多学科的许多科学家几十年辛勤工作的结果, 但亚洲特别是中国仍是解决这个问题不可忽视的地区。从野外工作量和多学科研究量来看, 我们较之非洲差的甚多, 但在中国, 已发现了从距今 1000 多万年至 400 万年的古猿化石, 也已找到距今 100 多万年前的人化石、文化遗物和其近亲巨猿化石, 所缺的是距今 200 万年左右的人化石和文化遗物, 以及 200—400 万年前的人化石。第四纪古环境的研究表明这个时间段或稍早的上新世的中国大陆适于人类生存。如果能多学科配合, 连续有效地开展野外调查研究, 找到距今 200 万年左右的人类化石和其创造的文化遗物决不是缘木求鱼, 而是成事在人。中国是能为人类起源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的。

参 考 文 献

- 卫奇. 1985. 东谷坨旧石器初步观察. 人类学学报, 4(4): 289—300.
- 卫奇, 孟浩, 成胜泉. 1985. 泥河湾层中新发现一处旧石器地点. 人类学学报, 4(3): 223—232.
- 尤玉柱, 汤英俊, 李毅. 1980. 泥河湾组旧石器的发现. 中国第四纪研究, 5(1): 1—13.
- 文本亨. 1978. 云南谋盆地发现的旧石器. 见: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编. 古人类论文集——纪念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写作一百周年报告会论文集汇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26—135.
- 刘东生, 丁梦林. 1983. 关于元谋人化石时代的讨论. 人类学学报, 2(1): 40—48.
- 刘东生, 丁梦林. 1985. 中国第四纪地层和更新统上新统界限. 中国第四纪研究, 6(2): 9—18.
- 李普等. 1976. 用古地磁方法对元谋人化石年代的初步研究. 中国科学, (6): 579—591.
- 李超荣, 谢廷琦, 唐云俊. 1983. 大同青瓷窑旧石器遗址的发掘. 人类学学报, 2(3): 236—246.
- 李宜民, 张森水. 1984. 资阳人 B 地点发现的旧石器. 人类学学报, 3(3): 215—224.
- 张森水. 1987. 中国旧石器文化.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 周明镇, 张玉祥. 1974. 中国的象化石.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房迎三, 杨达源, 韩辉友等. 1992. 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埋藏学的初步研究. 人类学学报, 11(2): 134—143.
- 胡承志. 1977. 云南元谋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 地质学报, (1): 65—69.
- 浦庆余, 钱方. 1984. 对元谋人化石地层——元谋组的研究. 见: 周国兴, 张兴永主编. 元谋人.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75—86.
- 钱方. 1985. 关于元谋人的地质时代问题——与刘东生等同志商榷. 人类学学报, 4(4): 324—332.
- 贾兰坡, 王德. 1957. 泥河湾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 科学通报, (1): 30—31.
- 贾兰坡, 王德. 1978. 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 北京: 文物出版社.
- 黄慰文. 1985. 小长梁石器再研究. 人类学学报, 4(4): 301—307.
- 谢飞, 成胜泉. 1990. 河北阳原岑家湾发现的旧石器. 人类学学报, 9(3): 265—272.
- 曾祥旺. 1995. 牛坪城旧石器材料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文物与考古, (4): 1—9.
- 裴文中. 1948. 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 上海: 商务印书馆.
- 裴文中, 张森水. 1985. 中国猿人石器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Black D, Teilhard de Chardin, Young C C et al. 1933. Fossil Man in China. Geol Mem Ser A, (11): 6.
- Clark D, Schick K. 1988. Context and content: impressions of palaeolithic sites and assemblag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 of China. *Jour Hum Evol*, (17), 439—448.
- Coles J, Higgs E. 1969.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an*. Glasgow, The University Press.
- Harris J, Isaac G. 1976. *The Karari Industry, Early Pleistocen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rom the terrain east of Lake Turkana, Kenya*. *Nature*, 262, 102—107.
- Isaac G. 1989. *The archaeology of human origins studies of the Lower Pleistocene in East Africa 1971—1981*. In: Barbara Isaac ed. *The Archaeology of Human Origi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9—171.
- Kibunjia M. 1994. *Pliocene archaeological occurrences in the Lake Turkana basin*. *Jour Hum Evol*, (27), 159—171.
- Leakey M. 1971. *Olduvai Gorge III: Excavations in Beds I and II, 1960—196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06.

ON THE PROBLEMS OF SEEKING THE EARLIEST (ABOUT 2 Ma) HUMAN REMAINS IN CHINA

Zhang Senshui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Academia Sinica, Beijing 100044)

Abstract

Most archeologists and paleoanthropologists claim that the human originate in Africa, we consider that Asia, specially China, could not be neglected to be a possible region of the human origin, because many fossils of ancient apes from over 10 Ma to about 4 Ma, human fossils and cultural remains from 1.7 Ma to upper paleolithic have been found in China. Because human fossils and cultural relics dated about 2 Ma had not yet been discovered an empty gap of the human evolution clearly exists between the fossil ape and *Homo erectus* there.

On the basis of paleosedimentary environment of early Pleistocene and the characters of stone artifacts of pre-early paleolithic, China could be able to make a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the subject on the human origin study. If the extensive survey and the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will be undertaken in the important regions of China, such as Nihewan basin, Yuanmou basin and Three Gorge region, it is well promising to encounter the earliest (about 2 Ma bp) cultural remains and to fill in the empty gap mentioned above.